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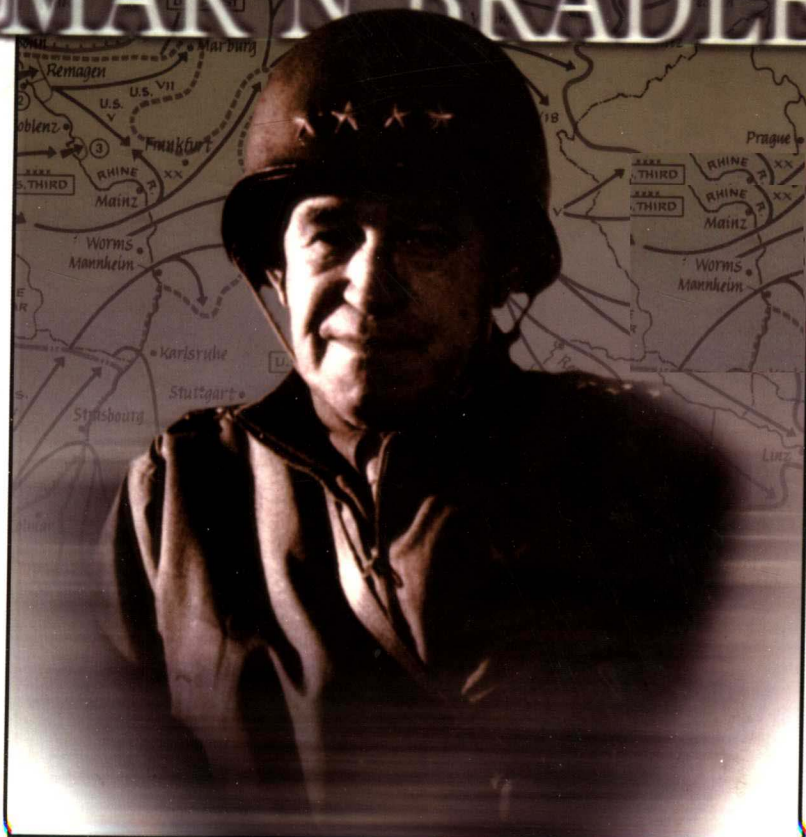
布莱德雷将军

战争回忆录

〔美〕奥马尔·N·布莱德雷 著

郭莹译

OMAR N BRADLEY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

〔美〕奥马尔·N·布莱德雷 著
郭 莹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 / (美) 布莱德雷著; 郭莹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书名原文: A General's Life
ISBN 7-5065-5230-2

I. 布… II. ①布…②郭… III. 布莱德雷 .O.N.
(1893~1981) —回忆录 IV.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691 号

图字: 军 2006—041 号

根据 OMAR N. BLAN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人授予本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在中国
大陆、香港、澳门范围销售发行的权力, 侵权必究。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595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50.00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1893—1981年),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布莱德雷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利文沃思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进修深造,其间,在南达科他州立学院、西点军校和本宁堡步兵学校执教。1941年2月,布莱德雷担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1942年2月起,先后担任第82空降师、第28步兵师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德雷率部征战北非和欧洲,历任美军第2军军长、第1集团军司令、第1集团军群司令和第12集团军群司令。战后,他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出任美军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本书原名《一位将军的一生》,于1983年出版,是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本人与传记作家克莱·布莱尔合作撰写的自传体战争回忆录,但是布莱德雷于1981年4月去世,未能看到此书出版。本书通过记述布莱德雷的亲身经历,着重回顾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和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披露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对打败法西斯德国做出的重要贡献。并通过详细记叙朝鲜战争的发展进程,披露了美国是如何决策发动侵朝战争的,反映了美军各指挥层次之间的种种分歧与矛盾,客观上暴露出侵略者在非正义战争中失败的事实。为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战争进程和内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布莱德雷始终是一位战争的直接组织者和重要的指挥者。他生性沉稳,处乱不惊,他精于谋略和指挥,善于驾驭全局,在盟军高级将领中享有“思想机器”的美称。布莱德雷参与制定了“霸王”行动计划、“眼镜蛇”计划、“伐木工”计划、“两路进攻”作战等一系列重大作战行动方案,参与指挥了突尼

斯战役、西西里岛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等重大战役。他在北非战场之初是巴顿第2军的副军长，后很快继任为军长。1943年4月，突尼斯战役全面打响，布莱德雷的第2军仅停敌就达4万人。7月，布莱德雷指挥第2军参加西西里登陆战役，盟军在此役中取得了最终胜利，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1943年9月，布莱德雷担任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参加制定诺曼底登陆计划。1944年7月，为解决诺曼底登陆后盟军被局限在科唐坦半岛上的僵局，布莱德雷制定了“眼镜蛇”突破计划：在美军地面部队发起攻击之前，由空军对正面德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眼镜蛇”行动是布莱德雷在盟军诺曼第登陆以后的指挥杰作，盟军这一成功的突破，实现了战局的重大转折：可以实施大刀阔斧的新攻势了。1944年8月，他担任第12集团军群司令，制定法莱斯围歼战计划。1945年3月，布莱德雷指挥的美军于中路作为主力进攻，蒙哥马利的部队在北侧作为辅助支援。在扫清鲁尔区的德军之后，由布莱德雷指挥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横穿德国中部，通过莱比锡—德累斯顿向易北河挺进，与攻到易北河的苏军胜利会师。。

战后，布莱德雷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1948年2月，他接替艾森豪威尔就任陆军参谋长，翌年8月，出任美军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积极协调各军种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使美军较为顺利地完成了战后调整和转型。

但此后，布莱德雷积极参与策划侵朝战争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及对我国领土台湾的侵占。他曾声称：“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出一条与共产主义的分界线，那么朝鲜就是理想的时机和地点。”尽管布莱德雷竭尽其所能，企图挽救败局，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勇敢顽强的作战精神，使他深刻感慨：“朝鲜战争是我们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不久，布莱德雷作为参与决策指挥美国“历史最糟糕的战争之一”的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退出现役。

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官，而且是我亲密的朋友和信赖的顾问。我想我至少在战略、组织方面和建设盟军指挥团队方面有一些发言权。布莱德雷是我军的战术专家，在我看来，他最终会被视为美国最杰出的战场指挥官。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目 录

第一部分	早年经历.....	(1)
第二部分	海外作战.....	(88)
第三部分	决战欧陆.....	(218)
第四部分	华府经历.....	(426)
第五部分	朝鲜战争.....	(517)

第一部分 早年经历

在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根据家谱记载，我的先辈于18世纪中叶从不列颠群岛移居美国肯塔基州麦迪逊县，19世纪初西迁，在密苏里州中部伦道夫县克拉克村和煤城希比附近的一小块贫脊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我们一家都是普通的农民，诚实爽朗，勤耕苦作，但仍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内战期间，我的祖父托马斯·明特·布莱德雷才十几岁，就在联邦陆军中当上了二等兵。他复员回家后，同克拉克村贫苦农家的女儿萨拉·伊丽莎白·刘易斯结了婚。他们一共有9个孩子，长子约翰·史密斯·布莱德雷生于1867年2月15日，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同他住在密苏里州所有的家族成员一样，开始时也是个乡巴佬，但后来成了家族中第一个有出息的人。小时候由于家境贫穷，无力上学，他只能靠自学，直到19岁才进入克拉克附近的一所乡村学校。他才思敏捷，学习进步很快，两年后就能在乡村学校执教了。大约在1888年上，他踏上了人生的征途，开始自谋生路。

父亲惊人地集拓荒者、运动员、农夫和知识分子的品质于一身。他体格健壮，胆识超群，又是出类拔萃的猎人和神枪手，可谓伦道夫县的佼佼者。他倡导棒球运动，自己制作球棒，既是一名击球手，又会投曲线球。他在当地组织了棒球队，成了一名球星。学校放假时，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常给农场主打短工或租田耕种。农耕之余，他见书就读，博览群书。父亲每到一地教学，他就会为学生们建立起小图

书馆，鼓励他们刻苦攻读。

父亲身强力壮又很有办法，把那些无法无天的农家顽童管教得服服贴贴，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学校一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总要请他出马。所以，十几所乡村学校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些学校同属一个教学区，都在希比周围大约 15 至 20 英里的范围内。他的最高月薪是 40 美元左右。

在父亲执教的第四年，他 25 岁时，父亲爱上了费尔维尤学校的一个女学生萨拉·伊丽莎白·哈伯德。她是亨利·克莱和玛丽·伊丽莎白·斯普琳所育五个子女中的一个，生于 1875 年 4 月 18 日，当时才 16 岁。1892 年 5 月 12 日，约翰·布莱德雷同萨拉·哈伯德就在哈伯德家结了婚。9 个月之后，即 1893 年 2 月 12 日，林肯诞生的日子，我出生了。父母给我取名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奥马尔是父亲所推崇的当地报社编辑奥马尔·D·格雷的名字，纳尔逊则是当地的一位医生的大名。

在我 3 岁半时，我的姨母埃玛·博吉因患肺结核去世，留下两个女儿——7 岁的内蒂和 6 岁的奥普尔。几个月之后，我的外婆也相继病逝。哈伯德家再也没有女人照料内蒂和奥普尔，父母便收养了她们，这姐俩和我朝夕相处。1900 年 2 月，我的弟弟出生了，取名雷蒙德·卡尔弗特。但弟弟在还差几天才两周岁时，就患猩红热死去了。此后，父母就再也没有要孩子。

由于父亲执教的学校经常变换不定，我就跟随他在希比镇各式各样的简陋木屋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899 年秋，我 6 岁时，开始在希比镇南 10 英里的彭伯顿上学。次年，举家迁居，我进入霍华德县洛卡斯特格罗夫学校。1903 年，我转入希比镇南 10 英里的哈里斯堡的鲍德里奇学校。这些学校都只有一间教室，我父亲是惟一的教师。

因为买不起马和马车，父亲总是带着我提着饭篮步行往返于学校间。乡间的道路都是土路，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是尘土飞扬，就是泥泞遍地；冬季则是冰封雪冻。父亲的步子大，走得快，17 分钟就能走 1 英里。一天的行程，尤其是在寒冬季节，对一个孩子来说，可真有点吃不消。但我觉得，每天有这么多时间单独同父亲在一起，在很

大程度上倒是一种精神力量。

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学生们按年龄和年级分组，都在这一间屋子里上课。父亲从一个组走到另一个组，分别讲课和布置作业。在孩子们学习字母之前，他就开始教单词。他讲课一般都不备课，拿起来就读。我识字很快，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在晚上睡觉之前，父亲还要给我出几道数学题让我思考。

家庭环境的熏陶培养了我好学上进的习惯。当我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后，便开始贪婪地阅读诸如沃尔特·斯科特的《伊凡霍》和基普林的《丛林丛书》。我对法兰西和印度革命，以及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书籍特别感兴趣。我喜欢在地毯上玩战争游戏，经常和小伙伴一起用骨牌筑城堡，用空子弹壳排散兵线，用芦苇杆或钢管做成“重型火炮”，把蚕豆当作海军炮弹来轰击“城堡”。在我的战争游戏中，美国总是胜利的一方。

父亲是一名好猎手。我们餐桌上的肉食，几乎全是他用双管猎枪打来的野味，有野兔、松鼠、鹌鹑、小熊、野鸭和鹿。我刚6岁，父亲就给了我一支气枪，带着我出去打猎。用气枪虽然打不着飞禽走兽，却是很好的训练。父亲教我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当心不要踩到枯枝和沙沙作响的树叶，集中精力观察前方。他还教会了我如何安全用枪。有时我也单独外出打猎，用气枪在湖畔打青蛙。当看到餐桌上摆着自己打的青蛙时，心里自豪极了。

父亲看到我会使枪了，便给了我一支单发步枪，这下让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第一次打松鼠出的洋相狼狈极了。当时，我瞄准松鼠连放三枪，可是松鼠却毫发未损、纹丝不动。父亲过来检查步枪，发现准星和缺口不在一条直线上。他把准星校正后说要打它的眼睛，接着举枪瞄准，松鼠应声倒下，果然正中右眼。我倍加折服父亲的枪法，此后更加刻苦地练习射击，决心不再出这种洋相。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我终于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神枪手。一次，我同表哥一起玩耍，我让他把一只鸡蛋抛向空中，然后立即举枪射击，正好打中鸡蛋，表哥的头发立马成了蛋卷。

我母亲长着一双蓝眼睛，她在20岁前就满头灰发了。母亲个性

刚强，勤劳朴实，善于操持家务，堪称贤妻良母。她自己种菜、烤面包，还学了一手娴熟的缝纫技术。父亲在政治上是人民党人，他同情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支持他们反对当时的铁路和信贷老板们盘剥贫民百姓的各种做法，赞成当时旨在限制“强盗式的富商巨贾”的谢尔曼反信贷法案、州际通商法案和其他措施。父亲虽然不是演说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可是在家里的晚餐桌旁，他常常在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的父母都没有鲜明的宗教观点，但可以说都是基督教徒，只是在吃饭时不做感恩祷告，也不读圣经或唱宗教颂诗。每逢星期日，我们全家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步行到基督教堂去。我父母都很虔诚，他们过着一种基督教徒式的生活，身体例行地教育了我。

1905年，那年我12岁，我们全家迁往希比镇。这样，我就进入镇里的公立学校。可是，父亲却吃苦了，他为了在需要他的乡村学校继续教书，不得不每天往返步行14英里的路程。当时，我家以515美元的拍卖价买了一所小房子，现付65美元，抵押价款450美元。为了付清这笔钱，我家负责管理一个包括90家用户的乡村电话交换台。这个交换台就安装在一间卧室里，全家在夜间轮流值班。

希比学校的校长看了我的成绩，在对我进行了基础考核之后，我越级上了八年级。新环境令我感到新奇，因为我还从未见过同班同学都同属一个年级的学校。我当时才12岁，是班里22个男女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习成绩却很出色。那时候8个月为一学年，我的各科总平均分数是94分，在班里名列前茅。

这一年，除了周末，我们父子难得见面。第二年，我13岁，父亲给我买了一支新的气动猎枪，并把他那支后座力很大的旧猎枪也给了我。此时，我的枪法已是弹无虚发，在父亲发现的猎取鹌鹑的地方，一举枪就打下一只鹌鹑，这令我颇为得意。打弹弓也是百发百中，我常用弹弓打野兔、松鼠和麻雀。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想考我，他把一美分硬币抛在地上，我后退20英尺左右，第二次就击中了。

我家尽管有双份收入，但家境仍然非常贫困。我们不得不想方设

法挣钱，设陷阱捕获野兽，从树洞中采集蜂蜜，或到伯顿附近采集药材。采草药相对比较赚钱，父亲常带我在清晨坐上前往伯顿的火车，采完草药后，我们步行 20 英里回家。等草药晒干后，我们就能卖上个不错的价钱。

在夏日的希比镇，我和父亲一样，兴致勃勃地打棒球。我们一群男孩总是在上午 9 点就聚集在棒球场上，一直玩到吃午饭，午饭后步行 1 英里到乡间小湖里游泳，之后返回棒球场一直玩到吃晚饭时才收场。在我不打棒球时，常和堂兄弗雷德·布莱德雷一起玩接球。我们能把球掷出 300 英尺远，相当于一个橄榄球场的长度。

我在希比高中读书的第二年，进入了只有 12 个人的所谓“二年级班级”，老师给予了我们极为密切的关注。我的期末平均成绩为 98.66 分，名列全班第一。学生时代的我是个操行很好的青年，在那一年的两个学期里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07~1908 年冬，希比分外寒冷，十分难熬。父亲在埃贝尼泽学校任教，每天往返步行 6 英里，冬天倍加艰辛。一月份的一天，他拖着沉重的病体回到家里，经医生诊断是肺炎。他卧床几天之后，一天凌晨 4 点，在家中溘然长辞，去世时差两个星期 41 岁。

父亲的死对于母亲和我，亲戚朋友以及整个社区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希比新闻周报》这样写道：

近年来，没有哪一个人的去逝在我们社区引起如此广泛的悲痛。一周前，这个充满活力、待人宽厚的男子汉沉沉地睡去了。这个消息令他的亲人和朋友们难以接受……

他是我们社区里最好的公民。他对自己、对所有与他交往的人都绝对诚实，对于任何一件事都做到问心无愧。尽管他已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仍要感谢上帝让他曾经生活在这里，他的人格如此完美，他将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影响着我们。为了表达对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优秀公民的敬意，我们建议在他出殡之日所有商家闭市停业，除了生病的人外，所有人都应去参加葬礼。这是他应得的礼遇。

在父亲去世时，我患重感冒卧床不起。母亲认为我该留在床上养病，所以我没能见到父亲的遗容。在基督教堂举行葬礼和到洛格教堂

公墓安葬父亲的那天，我仍然是疾病缠身没能恢复。《希比新闻周报》在报道父亲的葬礼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周六上午，约翰·S·布莱德雷的葬礼在基督教堂举行。很多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前来参加葬礼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尽管这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但在整个葬礼过程中，人们已忘记了严寒，忘却了时间的流逝，来晚的人很难找到空座位。W·W·波特曼宣读了简短、感人且满怀深情的悼词。之后，应其家人的要求，打开棺木让约翰的朋友们见了他的最后一面。虽然大家都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即便是人群当中最坚强的人在约翰的遗容前也都泪流满面。很少有人能在逝后能得到如此广泛地哀悼和怀念，这也是一种人们给予他的特殊礼遇吧。

我深爱的父亲离去时，我还差几天才满15岁。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了那笔住房押金的沉重债务，我和母亲基本上无力偿还。但他给我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感谢父亲，造就了我坚强的性格。我决心无论我们的家境多么贫寒，我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考上大学完成学业，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我决不虚度光阴，碌碌无为，一定要努力工作。他教给了我太多东西：爱好户外运动，狩猎和体育运动；富有正义感，无论贫富贵贱，尊重他人；正直诚实、克制忍让、热爱祖国、笃信宗教。这是一位父亲留给儿子最宝贵的财富，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对儿子来说是最大的动力。

在父亲死后数月，我们就举家迁往莫伯利。莫伯利是一座较大的新兴城镇，在希比以北 15 英里处，沃巴什铁路工厂和布朗制鞋公司就是在那里发迹的。为了养家糊口，妈妈当上了职业裁缝，并在家里接纳寄宿实习生。我们还把在希比的住房租给了别人，赚取租金以偿还那笔押金。我开始干零活——叫卖《莫伯利民主报》。那年秋天，我进入莫伯利高级中学学习。我是一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从未见过那么壮观、漂亮的校舍。但学校决定让我留级 1 年，到 1911 年才能毕业。由于该校是四年制，这样一来，我成了二年级学生，离毕业还有漫长的 3 年，这令我沮丧极了。

这时，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更大了。莫伯利高中没有正式的运动队，只有两个非正式的田径队和棒球队，我参加了这两个队，但兴趣最大的还是棒球。队员们自制运动器械，联系同其他学校的比赛。有一段时间，我们玩得很痛快，整天泡在球场上。经过长期不间断的练习，我接球熟练，投球远而有力。撰写学校 1909 年年鉴的编辑是这样描述我的：“尽管外表不像运动员，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我母亲每逢星期日总是带着我去教堂。我们去的是中心基督教堂，那是一座崭新的石头建筑，塔尖高耸入云，十分引人注目。1909 年 2 月 14 日，在我 16 岁生日后的第二天，我在教堂地下室的水槽里接受了洗礼。

我在全日制学校的老师尤多拉（多拉）·奎尔是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叫玛丽·伊丽莎白，生于 1892 年 7 月 25 日；次女叫萨拉·简，比玛丽小两岁。她们家与我家隔街相对。多拉的丈夫查尔斯·奎尔曾是莫伯利市执法官（相当于警察局长），1902 年死于肺结

核，年仅 35 岁。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其中包括两所房子。多拉同两个女儿住在一所房子里，把另一所租给别人以补贴家用。

我当时被玛丽·奎尔迷住了，但她比我大 6 个月。而且由于我“被迫留级”，玛丽比我高一年级。当我第一次见到玛丽时，她已经有了情人。那个人年龄比她大，中学已经毕业了。我那时在姑娘们面前很害羞，觉得自己是个对城市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加之整天忙于作业、体育运动和家务劳动，所以在中学时很少与女生交往。不过，由于我们两家是街坊，又常常去同一个教堂，就渐渐和玛丽熟悉起来了。

后来才弄清楚，原来让我留级是搞错了。于是在 1909 年秋，我升入莫伯利中学三年级，就是说，到 1910 年 6 月，我就可以毕业了。我在多拉·奎尔教的那个班，那是一个从初中起就形成的严密的宗派小集团。除玛丽和棒球队的伙伴以外，我几乎不同任何人来往，成了来自希比的“孤独者”或“局外人”，所以会被莫名其妙地随意留级或跳级。

入冬，在森林公园的湖面封冻之际，滑冰成了最受欢迎的运动。我练习滑冰多年，技术很不错。但就在那年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一个男孩在冰上迎面相撞。他的头撞在我的牙齿上，我满口的牙几乎全松动了，牙床也受到严重损伤。要是经济条件许可，本来应当找牙医修饰一下或作些必要的治疗。然而，我当时腰无分文，无钱看病只能束手无策。本是一点轻伤，却酿成了伤筋断骨的大灾难，令我遗憾终生。多年以后，我的牙齿和牙床还常常找我的麻烦，有时还折磨得我非常痛苦。为了不让那些参差不齐的门牙留下不雅观的永恒记录，我在照相时从来不笑，总是紧闭双唇。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自己年纪轻轻的就要把牙齿全部拔掉。

1910 年 5 月，我毕业了。在莫伯利中学的两年期间，我的学业成绩优异，但不是最好的，自然科学（96 分）和数学（94 分）比英语（90 分）和历史（85 分）成绩好，总平均分数为 91.4 分。学校的年鉴会用一个独特的形容词来概括每一个高年级学生的性格特点。玛丽·奎尔的学习成绩是全班第三名，尤其擅长语言，被誉为“语言学

家”。我以数学见长，于是被封了“计算学家”的头衔。巧合的是，玛丽和我的照片被无意地并排印在了年鉴同一页的下方。

中学毕业时，我想当律师，但苦于无钱深造，不得不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而且我还有另一个担心就是家里没有了我，母亲的日子会更加艰辛。我打算继续做去年夏天在沃巴什铁路上的活计，干上一年，就能攒几百美元，足够到哥伦比亚上完密苏里大学。于是，我在1910年夏天回到沃巴什铁路上，起初在供给处干老本行，后来到锅炉车间帮助修蒸汽机，那里的工资待遇较高。我每周工作6天，每天9小时，计时工资为17美分，每月大约可挣40美元。

玛丽·奎尔的姑妈帕皮塔是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师范学校的教师。玛丽决定去圣克劳德同她姑妈住在一起，并在那里上大学的头两年。要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两年后她再回到密苏里继续上大学。1910年秋，玛丽前往圣克劳德上学，在这之后的几年间，我很少能够见到她。

这年夏秋之间，我的35岁的寡母开始同一个男人交往。此人名叫约翰·罗伯特·马多克斯，也是一个贫苦的农夫，听力有点毛病。他的妻子玛丽在不久前死去，留下两个幼小的儿子——7岁的戴维·拉塞尔和2岁的查尔斯·威廉。我母亲对抚养这两个小男孩，表现得毫不犹豫，他们在1910年的圣诞节结婚了。于是，我有了继父和两个小弟弟。马多克斯一家三口搬到我家居住，学裁缝的寄宿实习生搬走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卖掉了原来在希比的房子，按照县司法长官的裁决，共卖得441.2美元，足以付清那笔抵押债，母亲的肩头总算卸掉了一副重担。

母亲的再婚，促使我下决心离家去上大学，不再去想这些家务事。我的奋斗目标是在1911年秋进入密苏里大学，直到有一天，全日学校负责人约翰·克拉森和我的一次谈话令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克拉森问我：“你为什么不报考西点军校呢？”我当时的社会知识有限，对西点军校知之甚少，于是很天真地回答道：“我交不起西点军校的学费。”

克拉森告诉我，西点军校不仅免费，而且每月还发少量的零花钱。他详细地告诉我，考生应如何争取国会议员的提名选派，如何同其他考生竞争。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可她并不太支持。西点军校远在纽约州，距莫伯利千里迢迢。可是，我越想越觉得西点军校好像就是专门为我这样的穷光蛋设立的。于是便工工整整地给密苏里州的议员威廉·M·拉克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上西点军校的愿望。拉克住在基特斯维尔，离我家只有 30 英里左右。他很快就复信表示歉意，说当时没有空额可补。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律，每个众议员和参议员每四年才能向西点军校推荐一名学员。当时是拉克任期的第三年，即在我正式提出申请之前，还需等待整整一年。我觉得时间太长了，又想还是按原计划上密苏里大学吧。

事有凑巧，就在那年春天，国会修改了向西点军校选送学员的法案。修正案规定，众议员和参议员每三年就可以向西点军校推荐一位学员。也就是说，拉克在 1911 年就能向西点军校推荐学员了，但时间确实晚了些。6 月 27 日，拉克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向我说明了最新规定，但说他要正式推荐基特斯维尔的一名男生登普西·安德森。如果我确实想去，可作为一名候补推荐对象，要是安德森的智力测验和体格检查不合格，而候补生又有两项都合格，我就可以成为被推荐人。考试定于 7 月 5 日在圣路易斯的杰斐逊兵营举行，这时距离考试只有 8 天了。

我把信反复看了数遍，琢磨了很久。在有了报考西点军校的念头后，我就查阅了关于西点军校的文献资料，了解到考试科目包括地理、几何、代数和我最害怕的英语。自从三年前离开希比中学以后，我一直把代数书束之高阁，从没摸过，脑子都快要锈死了。为应付考试，放弃赖以谋生的工作去死记硬背书本，似乎有些得不偿失。我只好在干完一天的苦力之后，在晚上温习功课。这时，离考试只有 6 天了。我想安德森可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把来之不易的维持基本生活的钱花在往返圣路易斯的路上，去同一个无法匹敌的对手争高下，简直是件愚不可及的事情。